

不做袖手旁观的群氓和时代的看客：没有天生的良政只有不肯失语的清醒公民

JokingKong · 2026-07-21 21:38

在日常生活的微澜中，我们常常能听到一种颇具迷惑性的劝诫：过好自己的日子，别去碰政治——在许多人的潜意识里，政治这两个字，早已被岁月熬煮成了一锅面目模糊的浓汤，里面翻滚着权谋、阴谋、宏大叙事以及普通人难以企及的特权偏见。于是，人们乐于扮演一个双手插兜的看客，在茶余饭后的安全地带，对那些远在天边的权柄交替发出几声冷淡、深邃、克制、疏离、世故的喟叹，转头又扎进各人自扫门前雪的琐碎平庸里。这种置身事外的精明，究竟是一种难得的清醒，还是一种慢性的自我麻痹？

大多数人以为不看、不听、不谈，就能在一张小书桌前安放下一生一世的清静，却忘了屋檐外的风暴从不因主人的闭眼而减弱半分。将公共事务的解释权双手奉还给少数精英，甚至寄希望于某位高瞻远瞩的“好人”来包办一切，这种看似省力的期待，恰恰暴露了我们在公民素养上的长期营养不良。

徐贲在2013年出版的《政治是每个人的副业》一书，正是在这样一种国人普遍秉持旁观者心态、公民意识较为薄弱的社会语境中，递过来的一面镜……不，应当说是一剂温和而清苦的醒酒汤。他带着一种少见的耐心，把那些被特权阶层垄断在象牙塔或深宫大院里的公共概念，逐一拆解、擦拭，然后交还到每一个普通人的手中。正如它所说的那样：

「即使在民主政治制度真的已经建立起来的地方，好的政治仍然不可能只靠少数好人来实现和维持，它离不开具有民主政治素质和经验的广大公民。民主政治的核心不是好人政治，而是公民政治。」

如此论断，直接掀翻了近代以来某些知识分子对“好人政治”的温情幻想。依靠个别精英的道德自觉来弥补制度的先天残疾，就像在流沙上搭建宏伟的宫殿，潮水一到，连断壁残垣都不会留下。真正的现代公共生活，从来不靠圣人下凡的恩赐，它赖以运转的，恰恰是千千万万个在菜市场、写字楼和地铁车厢里穿梭的，那些略显挑剔却足够清醒的普通人。

(一)精明公民的自我启蒙与知情门槛

我们常常把“公民”这两个字念得顺口，却极少掂量它背后的分量。在漫长的历史阴影里，专制遗留的依附心态如同一件洗得发白却脱不掉的旧衣，让许多人即便走进了现代社会的门槛，骨子里依然缩着脖子。那种对权威的盲目迷恋与顺从，包裹着一层厚厚的奴性，使得真正的公民觉醒变得步履维艰。在徐贲的笔下，一个合格的现代人，首先必须学着去当一个“精明的公民”。这种精明，绝非市侩式的斤斤计较，而是一种在公共生活里保持警觉、拒绝被轻易愚弄的理性能力。

精明的前提，是知情。如果一个人的信息管道被焊死，或者只能咀嚼那些经过精心过滤、喂养的

统一残渣，那么他的所谓思考，不过是权力操控下的巴甫洛夫条件反射。徐贲说得相当精彩：

「“知情”是公民的权利，包括知悉权、资讯权、信息权或了解权。知情是政治民主化的必然要求和结果，它不仅是一个法律领域（公法和私法）的概念，而且更是一个政府对公民思想、结社、知识传播是否拥有合法控制权力的概念。没有知情权便没有政治自由意义上的公民。不知情的“公民”会成为孤独的散沙个体，聚合为群氓。」

一旦失去真相的滋养，大众就会迅速退化为面目模糊的群氓，在每一个被煽动的瞬间群情激愤，又在每一个需要承担责任的关头作鸟兽散。

真正的自我启蒙，必定伴随着打破信息垄断的艰难尝试。无论是回看清末报刊传播民权思想的举步维艰，还是审视欧美历史上的地方自治实践，无一不在证明，公民精神从不是在温室里躺出来的，而是在每一次对公共信息的索要、每一次对权力的审视中锻炼出来的。一个好的政体，应该承受得住民众明达而挑剔的目光：

「人民之所以需要一个政府，一个政府之所以具有合法性，乃是因为政府能够保障个人的自由权利。受过教育的公民具备关于政府形式的知识，了解那些既能够制衡政府权力，又能使政府运行的政治制度。他们清楚地知道，即便是“最佳”的政府形式，对于民众的自由权利也不是充分安全的。因此，全体民众要随时对政府保持一种明达的、不松懈的警觉，否则不可能把政府权力关进笼子里去。」

这种警觉，不是为了无端生事，而是因为我们深知人性的局限。谁也不是天使，手握权柄的人若是没有一双双清醒眼睛的注视，那原本用于公共服务的权力，随时会变成吞噬私人自由的怪兽。

(二)公共生活的秩序、法治与道德的解毒

在我们的传统语境里，道德往往被赋予了过高的、甚至是不切实际的地位。特权阶层习惯了坐在高高的道德神坛上进行说教，口中含着仁义道德，手下握着特殊利益，这种表里不一的伪善，往往比市井无赖的粗鄙恶行更具杀伤力。它直接败坏了社会的公共信用，让普通人在一次次目睹“台上宣讲、台下分赃”的戏码后，陷入了死活不信的深渊。当空洞的道德宣称成为一种廉价的表演，公共生活里的冷漠便不可避免地蔓延开来。

徐贲《公共生活的“善”与“法”》一文中，以极其干练直白地荡涤了这些伪善的泡沫。现代民主制度之所以能够存续，恰恰是因为它不再寄希望于人性的完美，而是将重心放在了冷峻、缜密、克制、严谨的制度设计与权力制衡上。法律不是用来歌颂美德的，它是用来确立底线的：

「法律是公共生活的秩序，法律本身并不能保证就会有民主法治的合法性，只有受到制衡的立法、执法和司法，尤其是经由民选立法机构的立法，才具有民主法治的合法性。这个程序不能保证制定的法全都完善，但能保证这些法是选民自己参与制定的，因此也是选民自己可以参与修改的。」

唯有当民众真正参与到立法与监督的程序中，那些条文才不再是冰冷的惩戒工具，而成为社会道德的真实表达。

如果一味地用恐惧和惩罚来推行所谓的道德教育，其结果只能是批量生产顺从的奴才，而非理性的公民。美德如果脱离了自由意志，便会迅速腐烂：

「美德是人的自由意志的体现，一个人做好事是因为他自己愿意，出于他对特定事情的对错、是非的独立判断。做好事是他自身的目的，不是为了响应做好人好事的号召，也不是为了表现某个制度的优越性，或是对国家有好处。为实现外在目的的美德必然会因为丧失美德的自身价值而走向它的反面。」

我们在街头看到跌倒的老人没人敢扶，在报端看到路人的冷漠旁观，别总急着痛心疾首地哀叹道德滑坡。这往往不是人心烂了，而是制度的保障出了漏洞，是人与人之间底层的社会互助契约，被那些荒谬的司法判例或不公的权力介入给生生砸碎了。

缺乏基本社会公正的环境里，要求个体去充当道德英雄，本身就是一种隐蔽的残忍。徐贲评价道：

「在一个潜在契约和公正意识健全的社会中，人们一般比较容易做到“好好对待他人”。当一个公民的权利或人权受到侵犯，无端遭到政治迫害和诬陷，别的公民就会站出来替他说说话。说话的人并不一定是特别富有道德心和正义感，而是相信，一旦他自己陷入同等处境，别的人也会一样站出来为他说话。然而，一旦这样的潜在契约和公正意识遭到灾难性的全面破坏，则人人都将变得胆小事、谨小慎微。有谁受到迫害，所有其他人都会袖手旁观，拒绝出面相助。有人甚至还会落井下石，助纣为虐。人和人之间会充满了恐惧、戒备和猜疑，生活在一个与利他、信任和社会公正相陌生的世界里。」

要重建这种风雨同舟的契约，唯一的药方不是更响亮的喇叭，而是更公开、更公平的权力运作。然而，当政府习惯了隐瞒过错、回避质询，用所谓的“稳定”来搪塞一切公共危机时，公信力的流失便如同沙漏般无可挽回。这就不可避免地催生了大面积的消极怀疑主义。人们在一声声“算了、听天由命、谁知道呢”的叹息中，走向了彻底的犬儒社会。正如徐贲所说：

「信任匮乏的社会环境里，人们会普遍觉得难以信任他们本该信任的那些有地位、身份或权威的人士，如官员、教授、医生、专家。这时候，信誉匮乏也就成为一个社会性的普遍问题。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本该一说话就能让大多数人相信的许多权威，包括像宣传部这么重要的说话部门，现在说话也没有人信了。」

这种集体性的不信任，是社会最深刻的内伤。

当怀疑退化为一种条件反射，任何理性的公共讨论都将失去根基：

「当怀疑走向了极端，变成了“不信、不信、死活不信”的时候，就会变成非常有害的消极怀疑，它常被称之为“怀疑主义”，一旦蔓延，甚至会形成一个犬儒社会。这种心态往往导致对周围事情漠不关心、麻木冷淡，更有极端者，甚至对人的整个生存处境都消极对待，自暴自弃、听天由命、得过且过。在文化、政治思想中，这种怀疑主义往往与极端的道德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相伴生，认为世间根本没有可以取得共识的道德是非，任何人都可以按他自己的权力或物质利益随意行事，民主或独裁、法治或专制、宪政或极权都是“具有某国特征”的正当制度。」

在这种精致的虚无面前，任何关于美好生活的想象，都成了荒诞的笑话。

(三)权力、秘密，与被拉平的身份幻觉

现代公共生活的另一个巨大陷阱，在于统治集团对秘密的天然迷恋。有些组织在漫长的权力运作中，逐渐形成了一种类似囚徒困境的孤岛心态。他们需要用密不透风的防线，来隔绝公众探寻的目光，从而实现权力的集体私有化：

「一个集体既然要固守某些秘密，就一定有许多事情是不能让民众或“外人”知道的。这样的秘密集体，包括政党、政府或者二者合一的统治集团，往往会陷入一种类似“囚徒困境”的处境……权力与秘密的结合使得权力被“集体私有化”了，权力完全被属于一个小集团的少数人所掌控，一方面，他们认为只有他们才配分享权力，另一方面，他们会不择手段地想尽办法来保住这个权力。如此拥有的权力是不可能具有公开性和透明度的。」

这种对秘密的固守，不仅败坏了公共伦理，更在无形中拉大了阶层之间的鸿沟，催生出一一种被人为制造的不平等身份系统。

在过去的荒诞岁月里，人们的身份被粗暴地划分为红色与黑色，好机会由天然的“人上人”独占。而到了今天，金钱与权力的隐秘结盟，则编织出了一张更加复杂、也更加难以挣脱的等级之网。考分和金钱表面上给了每个人公平竞争的幻觉，可一旦到了涉及实质资源分配的关头，所谓的“路子”和身份，依然是那堵看不见却撞得人头破血流的南墙。这种身份的固化，让大部分处于底层的普通人陷入了无尽的焦虑中：他们可以拼尽全力去改变“我是谁”的现状，却注定无法触及那个被特权锁死的“我能是谁”的边界。

要打破这种令人窒息的固化，唯一的可能，就是将公民身份置于所有政党、财产、阶级身份之上。只有在一个能够保障公民平等行使权利的民主社会里，一个人的自由选择 and 角色设计才真正具有普遍的意义。徐贲说：

「一个社会要打破“身份固化”，就必须把平等和自由一起确立为基本的价值，强调公民身份高于包括政党、财产、阶级在内的任何个人身份，强调所有公民必须拥有参与国家大事的平等权利。公民的平等并不是因为人生来就是平等的。平等的基础不能建立在自然权利论之上。平等是一种人为的社会价值，而且是有条件的。只有当人们进入公众领域，成为有权利的公民，他们才能获得平等。现代国家中的“平等”价值与民主政治是密不可分的。只有民主的政治体制才能保证平等这一价值共识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在这种体制下，即便是拥有权利的公民，在面对具体的公共事务时，也需要区分什么是事实，什么是基于立场的看法。行使权利固然是不可剥夺的自由，但如何“明智”地行使，则考验着一个社会的文明成色：

「在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里，公民拥有哪些具体的权利，是由宪法规定的，是“事实”。对事实的认定是有客观标准的，所以总统可以说出事实。但是，在具体的公共事情上，单单凭权利行事是否明智，那是一个与个人判断有关的“看法”，不同利益的人们对同一件事情的看法会很不相同。即使总统，他的看法也只是他个人的，不能强加给其他公民。」

同时：

「在一个民主法治，同时又能被视为“善”或“好”的社会里，“明智”首先不是指对自己有好

处，而是指不伤害他人，形成符合人际伦理的行为规则。“明智”指的是对共同好生活的深刻而不是肤浅的了解，因此是一种“智慧”。对别人的苦难感觉迟钝、冷淡麻木，是不明智的。相反，对别人的不幸抱有同情，能替他人设身处地，感同身受，不在感情上伤害别人，则是明智的。

」

唯有当个体能够跨越自身的利益樊篱，对异己者的苦难感同身受，这个社会才能走出丛林状态，真正配得上“正派”二字。

而对于那些习惯了凌驾于多数人头上的统治集团而言，任何缺乏美德、不以被统治者福祉为目标的治理，最终都将失去其天然的合法性根基：

「少数人统治多数人若要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就不仅需要自己有美德，而且还要求他们的统治能以被统治的大多数人的福祉为目标。」

如果背离了这个方向，所谓的治理，不过是依靠强力维持的利益分赃罢了。

(四)国家不是公司：破除权力的高效神话

该书出版的那些年，一种披着“时髦”外衣的功利主义逻辑在舆论场上大行其道：人们喜欢把国家比作一个庞大的集团公司，把政府首脑看作长袖善舞的老板，而普通百姓则降格为拿薪水、听指挥的员工。在这种商业逻辑的浸染下，高效率、执行力、充盈的国库被捧上了天，而那些看似繁琐、内耗、迟缓的民主程序，则成了被嘲讽的对象。这是一种极度危险的认知错位。企业的目标是唯一的，那就是利润的最大化；而国家存在的理由，则是为了调和多元群体的复杂利益，追求社会的底线公正。

徐贲在第三篇中，极其利落地戳破了这个高效率的神话。政府如果真成了一家不受约束的巨型企业，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正如他所说：

「如果一个政府既能像一个高效率的集团公司那样运作，又能随意印钞票，那它可能是天底下最强大的政府，但一定不会是一个民主的政府。」

强大的政府如果失去了百姓在纳税和支出上的发言权，所谓的财政充足，往往会演变成行事跋扈与专横贪腐的温床。无度的征税和变相的勒索，被精美地包装在国家法律的名义之下，甚至还能通过宣传，让那些被剥夺的人误以为自己正享受着国家的无私爱护：

「无度征税与滥用税金总是联系在一起的，而这二者都是以国家现有法律的名义施行的。在那些只有实在法而没有更高法，或者根本否定、拒绝，甚至诅咒更高法的国家里，政府能够以国家法律的名义任意向人民征税，甚至还可以欺骗他们说国家爱护他们，没有向他们征税，钱本来就是国家的，本来就理应由政府随意支配。金钱对政府的败坏远甚于对个人的败坏。一方面，政府越是能够无度地征税，政府就越有钱，行事就会越嚣张，越不拿老百姓当一回事，政府官员则更是随心所欲、专横贪腐。」

接着他又补充道：

「另一方面，民众在纳税问题上越是没有发言权，对这样的政府也就越是束手无策。政府的好坏不能以它是否有钱，是否“国库充足”来衡量……政府的税收充足并非总是百姓之福，政府拥有征税的权威，也不是它深受百姓爱戴、拥护的证明。有钱的政府未必总是把钱花在人民的福利上

，而经常在财政上捉襟见肘的政府则未必比能够大手大脚的政府更不关心普通人的民生。」
国库的肥沃，很多时候不过是拔光了鹅毛的结果，而那些躺在账目上的数字，也极少能真正转化为普通人对生活风险的盾牌。

为了维持这种表面上的庞大与稳定，权力的操盘手们发展出了一整套精妙的宣传修辞。政治人物为了动员选民或平息质疑，总是乐于把复杂的政策分歧简化为非黑即白的两条路线之争，仿佛顺我者便是智慧与善良，逆我者即是愚蠢与邪恶。这种低劣的政治忽悠能否奏效，往往成了测验一个社会民智开启程度的试金石。更让人忧虑的是，当这种说谎的成本低到可以忽略不计的时候，伪善便会升级为一种极其无赖的、指鹿为马的强权逻辑：

「伪善者蓄意说谎，往往还有限度，因为他们要顾及自己的形象或颜面，而且多少还希望别人能够相信，所以不敢不计成本地说谎。后来，又发展出来一种“无赖说谎”，那就是在甚至不指望被骗人真的受骗的情况下，继续行骗。他们只要能堵住别人的嘴就行，根本不顾及自己的颜面，根本不在乎别人是否会把他们看成是无赖或恶棍，典型的便是黑白颠倒、指鹿为马。这是一种非常无赖的、不计成本的“蓄意说谎”，虽然是彻底的非理性，但却有它自己的逻辑，那就是，只要我有权力让你不敢或无法公开拆穿我的谎言，我就不是在说谎。当然，就算无赖说谎，也不会完全放弃使人相信的意图，所以也会不断改变自己的说法，寻找新的说辞。」

在这种逻辑下，说谎者甚至不再指望你相信，他们只需要你闭嘴，需要你配合这场权力的杂耍。为了达成这种整齐划一的顺从，他们还特别擅长躲在一些无名无姓的宏大词汇背后，利用群体心理的逻辑谬误来制造声势：

「有一种模糊说谎，利用的是那个叫做“借用众人（ad populum）”的谬误逻辑。它要造成的假象是，如果许多人都这么认为，那一定是对的。它总是用无名无姓、没有面孔、无法核实的“人民”、“群众”或“老百姓”来做主语。

利用“人民”的名义能造成人多势众、当然正确的宣传效果。自己喜欢的就说“广大群众”支持，自己不喜欢的就说“一小撮坏人”反对。例如，“受到群众好评”、“被传为佳话”、“广大群众说，……”、“大伙纷纷表示：……”、“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会……”」

这些被掏空了具体面孔的“人民”，成了权力手中顺手的挡箭牌，随时可以用来砸向任何一个敢于提出不同意见的独立个体。

(五)被规训的记忆与逃离集体的谎言

当我们把目光投向历史的深处，会发现权力对现实的钳制，必然会延伸到对过去的篡改上。徐贲在探讨集体记忆与往事纪念时，极其敏锐地指出了记忆背后的群体立场与伦理斗争。集体记忆不是历史教科书上那些冰冷事实的简单累加，它是贴近群体自我意识的感受，承载着群体的痛苦、尊严与身份认同。在一个健康的社会里，参与集体记忆意味着个体在群体中找到了自我的位置；然而，在现代专制权力的强行压制下，保存真实的历史记忆，本身就变成了一种极为悲壮的抵抗。

极权主义最厉害的地方，不在于它的粗暴，而在于它那极其善于变化与适应的意识形态。它像一种面面俱到的世俗宗教，对世界上的任何问题都准备好了标准答案。在压迫和洗脑下长大的人们

，连怀旧和审美都被深度规训而不自知。徐贲辛辣点评道：

「在这样一种异化的社会状态中，“生活在谎言中导致人类自我认同的深刻危机，这种危机转而造就了在谎言中生活的条件”。这是一种练就全体国民奴性的谎言，一种极权统治所独有的“组织的谎言”，也是一种使得国民自我教育和自我解放变得格外困难的集体谎言。当社会中所有的人都加入一种集体谎言时，谎言也就成了一种文化，一种对人的心灵有毒害的文化。要改变这种有毒害的文化，除了要改变强迫国民戴上假面在谎言中生活的政治制度之外，国民们自己通过历史的教训，反思自己在相似环境中扮演的相似角色，应该是争取脱离虚伪生存状态的关键一步。

」

要打破这种组织的谎言，唯一的途径就是重新夺回阅读与思想的自由。如果思想的源头早早被政治权力给武断地掐断，那么即便全民都在废寝忘食地阅读，也不过是在重复咀嚼统治者炮制出来的统一洗脑物罢了：

「一个社会中，仅仅有人，甚至有许多人阅读，并不能证明那个社会已经有了民主的言论和交流秩序，因为如果思想在产生的源头上被政治权力武断地禁止或掐断，那么人民只能阅读统治者为他们的洗脑而炮制的统一读物。自由阅读的前提是阅读物的自由产生，也就是自由的思想、写作和出版。只有当所有人都能够自由思想和自由表达的时候，阅读才会成为一种自由接受他人思想的途径。」

没有出版的自由，阅读便成了一种被圈定的思想苦役。

(五)志业与副业：拒绝专业主义的作茧自缚

在这场漫长的公民启蒙旅程中，知识分子的角色常常显得尴尬而微妙。古人说“观棋不语真君子”，这句流传了千年的老话，若是被严丝合缝地贴在公共事务上，便成了一种极其荒谬的逃避。那些所谓的专业政治人士和为之出谋划策的学院学者，往往最喜欢用狭隘的专业主义把公共政治圈定为“局内人”的游戏，暗示普通人因为不够专业，所以最好保持沉默。

徐贲在全书的序言里，极为有力地反驳了这种画地为牢的专业主义。知识分子的真正价值，恰恰在于他们热爱自己的公民副业，从而无法不成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真正的公知不是一种可以用来评职称、拿津贴、享受退休待遇的固定职业，它是一种在特定时刻为公共利益发声的志业：

「狭隘的、画地为牢的“专业”所导向的是知识者在体制内为自己争取经济利益、社会身份或名誉地位的“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那不是公民政治。知识分子应该是热爱自己公民副业的人，这使得他们不能不是公共知识分子。他们并不反对专业，但他们反对专业主义对人的思想进行束缚和限制。与意识形态禁锢相比，小门小户、刻板程式的学院化“专业研究”一样可以窒息人的思想。」

当学者们在体制内的小格子里为了名利斤斤计较，他们就已经在精神上阉割了自己。

公共政治不是少数人的私产，它是所有人都可以、也应该参加的游戏。那些揣着明白装糊涂的专业人士，偏偏喜欢装作高深莫测的君子，而揭露他们、批评他们，便成了普通公民无可推卸的权利与责任。这需要越来越多的普通人，都能把关心政治当作一件既尽责任、又能找到乐趣的“副业”。因为做公民是一件荣誉的事情，这种参与不是为了争取提拔、混入精英阶层去扮演举手机

器，而是为了在公共生活中践行真珍贵的自由。正如徐贲所说：

「副业与职业的不同在于，由于从事公民政治的普通人不能由他们的副业捞到一官半职，或得到什么油水、待遇或外快，这个副业才更成为一种“召唤”，成为一件心甘情愿、不能不做的事情。当然，会有讲究实惠的人，因为没有好处，所以不愿、不屑担当这个副业。但这不要紧，没有他们，社会里仍然会有足够多的人愿意把公民政治当作自己的副业」

此外，徐贲又说：

「对于每个普通人来说，公民的政治参与就是公民的副业。他们的政治参与不是争取入党或提拔以成为精英，也不是作为精英而成为制度中的“新鲜血液”、“改革派”、人民代表、政协委员，以特殊的身份在某种闭门的会议上举手表示赞成或是反对。这些都是在延续传统政治模式的“精英”参与，不是公民政治的每个人的参与。」

只有当普通人不再把政治当成升官发财的工具，这种基于“召唤”的副业，才真正具有了净化公共空间的力量。

(六)理性空间与正派社会的未来想象

在全书的尾声，通过与崔卫平的深度访谈，徐贲将讨论的落脚点放在了对“公民性”与“社会正义”的辨析上。在我们的日常交流中，有张身份证、拿本护照，只能说明你拥有了形式上的公民身份；但真正的公民性，却要求个体能够自由行使最高法律赋予的全部权利，并主动承担起公共讨论的责任。

然而，审视当下的网络环境，匿名保护下的言语暴力、人身攻击、不良动机的揣测四处横行。这恰恰说明，我们在形式上走进了现代，在素养上却依然留在了蛮荒。一个理性的公众空间，发表意见者必须遵守起码的说理规范。正如徐贲回答崔卫平时说的那样：

「理性的公众空间至少应具备以下三个特点。第一，发表意见者必须留下真实姓名，这本身就是对自己的言行负责的公共行为；第二，发表的意见应以说理来服人，必须遵守起码的说理规范，不人身攻击，不揣测对方的不良动机，不故意曲解别人的意思，等等；第三，发表意见者可以改变立场，但必须公开说明自己改变立场的理由，否则就成了出尔反尔。」

缺乏了这种基于尊重的理性说理，公共空间就会迅速沦为情绪宣泄的垃圾场。

而所谓的社会正义，归根结底关注的是社会制度和政府组织的正当性。正义与权力的关系，远比个体道德更为密切。一个正义的体制，最核心的考量在于它能否公正地对待身处其中的每一个人。徐贲说：

「正义与道德有关，但是，正义所涉及的不是个人道德，甚至也不是集体道德。正义涉及的是社会制度、政治体制和政府组织的正当性，也就是社会秩序。与道德相比，正义与权力的关系更为密切。人们在对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作道义判断时，关注的主要是这个体制或制度如何对待身处其中的个人，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体制或制度能否公正地对待所有的人。如果能，那么这个体制或制度就是正义的，即具有正当性，否则便不正义。」

当权力不再跨界干预，当各个领域的边界得以清晰划分，正义的微光才能照进现实的缝隙。

我们最终所期盼的现代文明，不过是渴望生活在一个因文明而正派的道德秩序里。这种道德的来

源不需要任何高高在上的意识形态赐予，它就根植于普通人内心固有的天良、恻隐与同情。由这种质朴的亲和力组成的公民社会，能让身处其中的每一个人，都成为独立而能动的道德主体：

「正派文明社会的成员不仅是国籍意义上的“公民”，而且更是文明风范拥有者的公民。公民风范让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成为能动而独立的道德主体。基于普通人的道德自我完足性，从公民社会中区分出来的就不是笼统的“个人”，而是一种有理性、有道德感的个体。这样的个体之所以道德，是因为他能够坚持像对待自己一样对待他人。」

在这一曲关于公民理性的漫长叙事中，《政治是每个人的副业》最终将那些宏大的宏观命题，轻柔而精准地降落在每一个普通人的日常微澜里。它不负责提供某种一劳永逸的乌托邦蓝图，而是以一种温和、清苦、笃定、清醒的姿态，剥离了特权阶层附着在公共事务上的层层伪善。当全书的合页缓缓闭合，那些关于权力、权利、记忆与正义的探讨，交织成了一道无法直视却又不可回避的微光。它不仅重构了国家与个体的契约边界，更在无形中拉平了被身份固化所撕裂的社会肌理，让每一个习惯了双手插兜的局外看客，在理性的审视下，不得不重新端详起自己作为“公民”的形式身份与实质性角色。

现代公共生活的良善与有序，从来不寄托于某个神坛上好人政治的降临，它真正赖以繁衍的，恰恰是无数个在菜市场与写字楼间穿梭的“精明公民”。把关心政治当成一件既尽责任、又能找到乐趣的副业，不过是要求我们在体制的谎言面前拒绝作茧自缚，在集体的冷漠中留存一份感同身受的文明风范。只要我们不曾将悲观视作宿命，不曾犬儒的潮水中彻底放弃对自由与尊严的向往，那么每一次对真相的知情索要、每一次对权力的不松懈警觉，都将成为通往未来公义大门的坚实阶梯。置身事外或许能换来一时的现世安稳，但唯有共同戳破高效率的神话、主动承担起公共理性的志业，我们才有可能在时间的荒原上，真正构建起一个因文明而正派的、具有主体能动性的现代文明社会。



扫码进原文:

<https://ximutan.com/forum/post/21>

以书会友，谈论天下

© 西木读书论坛